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五

# 史记

## 与咏史诗

上册

赵望秦 蔡丹等  
编著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五

赵望秦 蔡丹 张焕玲 俞江凤 贺欢 王璐 张海燕 编著

# 史记与咏史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W060）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顾问 霍松林

主任 李西建 张新科

委员 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 《长安文献资料丛书》编委会

顾问 霍松林

主编 赵望秦 张新科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冯文楼 刘生良 张新科 赵望秦 党怀兴 周淑萍  
高一农 高益荣 魏耕原

## 《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五

策划 赵望秦 张新科

撰稿

赵望秦 蔡 丹 张焕玲 俞江凤

贺 欢 王 璐 张海燕

##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首先，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期的文化。其次，它是一种兼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复次，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此期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在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藉国家“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本方向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

行系统研究。(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 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 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 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本研究方向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 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 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又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3) 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人民的喜爱,已经被选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本方向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份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

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汉唐文学研究丛书》、《长安学术丛书》、《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 古代诗人接受《史记》述略

### ——以咏史诗为中心（代前言）

咏史诗有两种体式，即隐括史传、以史为诗的正体或云传体，和感慨寄兴、以史咏怀的变体或云论体。咏史诗是融文学与史学特质于一体的重要诗歌体式，其创作立足于历史，取材于史料，《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通史巨著，又是史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传世作品，自然成为咏史诗创作者的创作源泉。《史记》所成功塑造的大批历史人物形象，也自然成为了他们或直接或间接的吟咏对象，由此而产生的咏史诗即为其接受《史记》的创作成果。这些诗歌既是反映《史记》对后世诗歌文学影响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是咏史诗中特殊的一类，于《史记》和咏史诗都有着不容小觑的研究价值。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联邦德国，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接受美学，其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康斯坦茨大学的尧斯和伊瑟尔两位学者。接受美学与此前文学研究方法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研究视角由作品转向了读者，以读者为中心，作品的意义是通过读者显现和丰富的，即接受美学的研究主体是读者与作品的关系，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在文学史上的决定性作用被明确提出。在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中，作品即本文自身是没有生命的，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才能获得生命和活力，对于一部作品而言，“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sup>①</sup>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就被引入中国，并广泛应用于中国古典诗歌各种题材、体裁的研究。如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研究》等众多的研究专著，论文则更是不胜枚举。纵览之，则可看出，运用接受美学

<sup>①</sup> 汉斯·罗伯特·尧斯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理论研究古典诗歌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是相当之快，为其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研究范式。然而，引进中国的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也难以逃脱“本土化”的结果，郑杰文教授有云：“从接受理论对于我国古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的影响来看，研究者借鉴的主要还是接受理论的基本方法和读者视角，而对于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操作方式大多借鉴国内接受理论的研究成果或者依据接受史的实际状况进行大胆的探索。”<sup>①</sup> 上述提到的著作、论文均遵循这样的研究范式。<sup>②</sup>

本文试图借鉴西方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的研究方法，以特殊的读者群——古代诗人作为接受主体，以咏史创作为探讨中心，依据《史记》与各个时期咏史诗的具体情况进行探究，梳理古代诗人对《史记》的接受历程，以期在此基础上厘清咏史诗与《史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史、史学史上的价值和作用。作为读者之中特殊群体的诗人，其文化修养、审美情趣、期待视野等方面和普通读者有所不同，其在广泛传播《史记》之时，既能使作品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完善，还能由此衍生、创作出更多的新作品，《史记》也因此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与意义。诗人接受《史记》之创作成果咏史诗，已成为《史记》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它们，《史记》才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完整的经典作品。

融文、史于一身的《史记》，其文学成就自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以来，也已得到世人的认可。司马迁以其非凡的文学和史学功底，真实的再现历史，塑造出众多感人肺腑的艺术形象。《史记》本身所具有的浓厚诗性，加上事件情节、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了创作母题和原型，《史记》也因此成为历来诗人写作咏史诗的取材渊薮。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诗人有不同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创作方式，其影响与接受在各个时期也就会随之出现不同的特点，这就形成了历代诗人《史记》接受史。

自东汉班固取材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作《咏史》一诗，诗人对《史记》的接受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数千年，诗人或咏其人其事，有专咏一人一事，有合咏数人，表达与司马迁之共鸣；或深化补充司马迁论赞者，也有与司马迁观点相悖而另辟蹊径者。纷繁复杂局面的形成，正是由于历代诗

---

① 郑杰文主编《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② 俞樟华《唐宋〈史记〉接受史》也是一部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史记》的著作，此书充分揭示了《史记》对唐、宋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其中也谈及唐、宋诗歌对《史记》的接受。

人审美经验、期待视野、价值取向、素养、理想以及社会政治、文学、史学等各种因素的不同所导致。后代诗人对《史记》的接受不仅表现在对《史记》本身的接受这一方面，还表现在对其接受成果的再接受上，使得接受之链不断丰富，这既反映出诗人对《史记》认识和接受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审美价值和社会风尚，对于更好的发掘《史记》和咏史诗的文化内涵有着重大意义。

## 一、两汉时期——萌芽期

《史记》早在司马迁在世之时就已经以单篇的形式流传长安城内外，到宣帝时全本便正式公诸于世。然起初并不被世人接受，且遭到极端的排斥，先是汉武帝怒而删书，汉明帝的“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即便是已然发现《史记》文学、史学价值的班固，亦很赞同扬雄对《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与经”的批评。但班固同时也肯定了司马迁的“良史之才”，在史学上对其接受颇多。其直接取材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缙紫救父”史实的咏史诗《咏史》，在咏史诗史、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在《史记》接受史上的地位则更为突出。此诗可说是现存的、第一首完整的以《史记》为取材渊藪的咏史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因急独茆茆。小女痛父严，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生。圣汉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愤愤，不如一缙紫。<sup>①</sup>

此诗吟咏的是西汉孝女缙紫救父之事，全诗以铺陈史事为主，详细的交代了缙紫救父之事，首先叙述缙紫救父的起因，即太仓公因罪被押送至长安，缙紫伤父之言，一路跟随前往长安，上书请旨，愿以己身代父，再叙文帝感其勇孝，废除肉刑，结尾两句诗人发出感慨，赞颂缙紫的至情至性，赞美其救父之举远胜男儿。班固将司马迁用两百字叙述的事件始末，用诗歌的形式简缩为八十字，不但述出全部史实，且于结尾处抒发其感慨。诗歌虽以叙事为主，也是有诗人感情寄托的。诗人晚年受不肖子连累下狱，心中难免生出悲凉之感，便借了缙紫之事表达自己的无奈与悲哀。此诗历代皆认为是开正体咏史诗先河之作，却因大量铺陈叙述，浓缩史实，被人讥为“质木无文”之作。然总观全诗，可以看出，诗人班固在诗中表达出了和司马迁一致的感情倾向，即对残酷刑法的不满和对至孝之人的赞赏，同时他还

<sup>①</sup>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0页。

接受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叙事方式和“实录”的著史精神。

两汉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排斥和“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史记》的传播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咏史诗发展也不成熟，是以此时期《史记》对诗人创作咏史诗影响颇小。

## 二、魏晋南北朝——初步发展期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独尊儒术”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玄学、佛教、道教和儒学并存的多元文化社会，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面对战乱和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世人皆期盼明君贤臣，渴望建功立业。此时期咏史诗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史记》的传播状况也大为改观，已经引起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并开始在诗人、学者之间广泛流传。随着世人对《史记》逐步深入的研究，其文学成就也被广泛关注，《史记》所载历史人物、事件成为诗人创作的源泉，众多诗人都受到《史记》影响，创作出大量以《史记》人物事件为吟咏对象的咏史诗，如左思《咏史》、张正见《韩信》和虞义《咏霍将军北伐》等，其中左思《咏史》八首，虽不全是吟咏《史记》中的人事，但其创作内容和思想情感两个方面受《史记》影响极为明显，其吟咏对象多为《史记》所描摹之人物，或专咏一人，或合咏数人。左思就是通过所吟咏的这些人物如冯唐、主父偃、司马相如等，将议论和抒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抒发自己处在门阀森严时代，才华不能得到施展的痛苦和愤懑。此组诗和班固《咏史》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之变体也即论体一派，使咏史诗的两种体式自此正式确立。

陶渊明更是此时期接受《史记》的典型，他的《读史述九章》明确标识是读《史记》有感：“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sup>①</sup>《史记》众多人物不同的身世际遇，深深影响和感染着陶氏，因此他采用四言的形式，记下其读《史记》之感，或专咏，如箕子的亡国之悲怆，韩非的以文召祸；或合咏，如伯夷、叔齐的坚贞，管仲、鲍叔的相知，程婴、公孙杵臼的仗义，屈原、贾谊的正直，鲁国二儒的耿介，亦或泛咏，如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以此寄寓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其它咏史诗《咏荆轲》、《咏三良》等也无处不充斥着接受《史记》的因素。

<sup>①</sup>（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2009年重印），第179—185页。

自汉末到魏晋，儒学和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制度逐渐瓦解，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时代逐渐到来，诗人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重视自我的价值。是以，忠臣勇士便成了诗人的首选，如三良、蔺相如、荆轲等，重点在于抒发个人的历史观念，从中生发出对现实的感慨。试举荆轲为例，其代表性的诗歌有阮瑀《咏史诗（其二）》、王粲《荆轲为燕使》、左思《咏史诗（其六）》和陶渊明《咏荆轲》等。在所有的史籍中，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荆轲形象最为鲜明生动，最具感染力，兼具历史感和艺术感。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司马迁笔下，轲既是勇士、义士、侠士、又是烈士，理应“名垂后世”，但同时陶氏也借了他人之口表达了对荆轲最终刺杀秦王失败的惋惜。上述四首诗作从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有勇有谋、侠肝义胆的悲剧英雄形象，这与司马迁的思想、感情倾向性是基本一致的。左思《咏史（其六）》避开了燕太子丹如何礼遇荆轲，以及易水送别秦庭之法等人们熟知的场景，而从“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哀歌和渐离，谓若旁无人。”的细节写起，道出了左思的与众不同，他和司马迁同样极为赞赏有真性情之人。“士为知己者死”是左思，也是司马迁做人的准则。陶渊明《咏荆轲》则详尽地叙述了荆轲刺秦事件的始末，将其看作是正义之士，对其视死如归的豪侠之气给予了高度赞扬，“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则是陶氏对荆轲失败原因的解释。诗人接受《史记》，不单单表现在取材上，审美倾向、对人事的褒贬标准等方面都已潜移默化。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各自统治，更加重视以史为鉴。史学和史书受到进一步的尊重，《史记》几为文人案头之书。是以，《史记》的传播力度大增，传播范围、地域、受众都很大程度上得以扩展。诗人对《史记》的接受也因社会政治、思想、学术等方面的影响，与汉魏两晋相比，呈现出新的特点。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南方汉族政权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难以打破对峙格局，长年战乱使诗人们渴望明君贤将再现，以拯救世人于痛苦之中，同时，诗人也期望自己战场杀敌，建功立业，以此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据不完全统计，南北朝诗人吟咏《史

记》之作有36首，约占其咏史诗总量的26%。<sup>①</sup>其中吟咏汉代人、事的诗歌较之前代明显增多，汉高祖成为时下诗人唱和吟咏之宠儿。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刘邦可谓是《史记》塑造的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从《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吕太后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传记的相关文字中，可以看出刘邦性格的多面，既有雄才大略，知人善用、积极进取，却也杀戮功臣、自私残暴，有些行为甚至堪抵流氓、无赖。范泰《经汉高庙诗》：“啸咤英豪萃，指挥五岳分。乘彼道消势，遂廓宇宙氛。重瞳岂不伟，奋臂腾群雄。壮力拔高山，猛气烈迅风。恃勇终必挠，道胜业自隆。”<sup>②</sup>开头四句先从正面描摹刘邦的雄才大略，然后诗人又以一代霸王项羽的失败，即“恃勇”是不顺应“道”的行为，必然失败，来衬托刘邦因顺“道”而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南北朝时期，统治者颇重文学，他们周围常常聚集一批文人，从事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吟诗作赋自是必不可少，因此，齐梁诗题中较多出现“奉和”、“和”之类字样，刘遵《和简文帝赛汉高帝庙》、徐陵《和简文帝赛汉高帝庙》就是和简文帝萧纲之作。这两首同题之作吟咏刘邦人生的不同方面，但均为简单述说，未过多掺杂自我感情，同后来众多或探究其夺天下之因，或批判起诛杀功臣之残暴、或嘲讽起虚伪狡诈之行径的诗作相比，对《史记》所载之刘邦的认识尚处在初级阶段，稍显苍白。

《史记》所塑造的一系列汉朝的文臣武将形象，如张良、韩信、霍去病、苏武等形象则不可避免的成为南北朝诗人的吟咏对象。南北分裂，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世人皆盼望贤臣名将再现，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有志之士也希望能建功立业，既有社会价值又有人生意义，所以他们笔下常出现前代尤其是距其年代较近且耳熟能详的汉朝文臣武将的身影。其中“王者师”张良和“匈

① 据赵望秦、张焕玲《古代咏史诗通论》所言，南北朝时期创作咏史诗的诗人及咏史创作的数量约为五十六人、一百一十六题一百三十九首，其中取材于《史记》的咏史诗作分别为：刘宋谢瞻《经张子房庙》、郑鲜之《行经张子房庙》、范泰《经汉高庙》、谢灵运“韩亡子房奋”诗、刘骏《咏史》、鲍照《蜀四贤咏·司马相如》；梁虞羲《咏霍将军北伐》、沈约《湘夫人》、王僧儒《湘夫人》、吴均《登二妃庙》《览古》、刘遵《和简文帝赛汉高帝庙》、萧纲《祠伍员庙》、庾肩吾《乱后经夏禹庙》、鲍几《伍子胥》、萧绎《祀伍相庙》、高允生《百里奚歌》、柳浑《长门怨》、费昶《长门怨》；陈陆山才《刻吴阊门》、周弘直《赋得荆柯》、张正见《赋得韩信》《行经季子庙》《赋得落落穷巷士》、徐陵《和简文帝赛汉高帝庙》、陈昭《明君词》、《聘齐经孟尝君墓》、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刘删《赋得苏武》、阳缙《赋得荆柯》、阮卓《咏鲁仲连》；北魏常景《赞四君·司马相如》；北周庚信“六国始咆哮”诗、《至老子庙应诏》《西门豹庙》、无名法师《过徐君墓》等。

② 钦定四库全书·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3页。

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是时人吟咏的重中之重。谢瞻《经张子房庙》、郑鲜之《行经张子房庙》和谢灵运“韩亡子房奋”诗为此时期咏张良之咏史诗的典范之作。前两首诗以地点为题，怀古意味已显，于咏史创作之怀古一体的形成有重要的开拓意义。<sup>①</sup> 谢瞻诗作跨越历史，怀念前贤，对张良辅佐刘邦成就大汉之功予以颂扬，叙说张良一生助刘邦之大事，历历在目。郑鲜之诗简洁明快：“七雄裂周纽，道尽鼎亦沦。长风晦昆溟，潜龙动泗滨。紫烟翼丹虬，灵媪悲素鳞。”开篇寥寥数十字，清晰的交代出自周至秦亡几百年之历史，一句“紫烟翼丹虬”即点出张良辅汉之功，足见其史学功底之深。谢灵运：“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亦是数语点出诗人对张良的崇敬。从上述可知，南北朝时期咏张良之作集中于对其辅汉之功的表彰与赞扬之上。此时的选贤制度依旧沿袭魏晋时期的门阀之制，世族势力还很庞大，寒门士子除了凭借军功似乎再无出路。是以，征战沙场、屡立战功，并以此博得高官厚禄的霍去病成为他们的偶像。司马迁笔下的霍去病是汉代杰出的青年将领，在抗击匈奴的边塞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战功，被汉武帝赏识，封为冠军侯。然在《史记》中，司马迁也写到了他骄纵奢侈、度量狭小、不爱士卒等，并对此严厉批评。但是南北朝时期吟咏霍去病的诗作大都颂其卓越战功，扬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气势，如虞羲《咏霍将军北伐》：“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凉秋八九月，虏骑入幽并。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羽书时断绝，刁斗昼夜惊。乘墉挥宝剑，蔽日引高旌。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骨都先自誓，日逐次亡精。玉门罢斥堠，甲第始修营。位登万庾积，功立百行成。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当令麟阁上，千载有雄名。”诗歌先描摹霍去病驱马带兵前往塞外之阵容，再渲染战场地势之险、战事之急，又写将军对此指挥若定，猛烈反击敌人，最后述出将军胜利、班师回朝。从出师到回朝，从战场到布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前方到后方，诗人仅用一首诗作便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史记》所载的一场汹涌澎湃之战役，读之令人动容。此诗一扫当时诗歌绮丽纤细之风，洋溢着雄壮慷慨之气，为此后边塞诗尤其是唐代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感情基调。《琴曲歌辞》中的《霍将军歌》云：“四夷既获诸夏康兮，国家安宁乐无央兮。载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来

<sup>①</sup> 谢瞻与郑鲜之诗作虽有怀古意味，也即有了自觉的怀古意识，但是他们的诗作大多是在叙述古人古事，于“今”联系较少，甚或未涉及当下，所以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怀古之作。

臻凤皇翔兮。与天相保永无疆兮，亲亲百年各延长兮。”<sup>①</sup> 诗作主旨是歌颂霍去病赫赫战功下给大汉王朝带来的和平安康。两首诗歌均为颂扬之作，代表世人呼唤英雄的心声。

此外，南北朝诗人不但热衷于吟咏汉代文臣武将，汉之前的贤者名臣也是他们笔下的宠儿，如夏禹、伍子胥、荆轲、孟尝君、鲁仲连等，这同样也体现时人对贤臣名将的热切期望。

### 三、隋朝——过渡时期

有隋一代只有三十八年的历史，朝代短暂，诗歌数量总体较少，取材于《史记》的咏史创作也相应较少，仅有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诗》、杨素《行经汉高陵诗》（残诗两句）和刘斌《和谒孔子庙》三首诗作，然其于历代诗人《史记》接受史，却有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灭亡（316年）以来近三百年南北对峙的历史局面。此时诗人多是来自北齐、北周及梁、陈的文士，大都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杨坚、杨广将其纳为己用，促进了南北思想、文化的进一步融合。诗歌风格已显兼容南北之气，但由于时代较短，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系统，过渡性特征相当明显，可谓长于继承而缺少新变。隋朝诗人评价张良的主调还是赞其足智多谋、颂其佐汉之功。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诗》，开篇四句：“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诗人对一生好老庄的张良理应羽化登仙，却最终“掩高封”之举发出疑问，改变了此前吟咏张良之作大多只论其盖世之功的格局。当然，此诗最主要的方面仍是表达其对张良的颂扬敬佩：“狙秦怀猛气，师汉挺柔容。盛烈芳千祀，深泉闭九重”，诗中没有对历史衰变的感伤，有的只是对古人胜事的赞颂和钦佩。这应当说卢作仍是具有怀古意味的咏史诗，为唐代真正意义上的怀古诗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基本的体式。

### 四、唐五代——成熟稳定期

至唐代，随着咏史诗的发展进入成熟繁荣期，诗人对《史记》的接受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司马迁的精神得以更深刻的表现。此时期，取材于《史记》的咏史诗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前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当朝对

<sup>①</sup> 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5页。

《史记》的极度重视以及《史记》已经称为科举考试的首考科目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和唐代诗人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创作方式等因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时，有唐一代诗歌的繁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发展。

重史崇史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历代统治者大多非常重视史书的整理、编纂工作，唐代的统治者尤其重视史书的教化垂鉴功能，大力倡导修撰史著典籍，在唐太宗和许多国家重臣，如房玄龄、魏征、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的共同努力下，编写出后来均列入“二十四史”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晋书》等八部史书，堪称奇迹。这些史书的问世，引领了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为人们重视历史典籍、以史为鉴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氛围。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记》确立为正史之首，其传播与研究力度大幅度提升，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长庆二年（822），“三史科”的设立，使《史记》正式成为士子考试必备科目：“历代史书，……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曄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sup>①</sup>《史记》从此展开了其全方位的传播，也因此拥有了大量的接受者。众多诗人研究《史记》的热情空前高涨，几乎人人都有接受《史记》的诗作问世，此时期应为诗人接受《史记》的繁荣期，他们不仅是以《史记》人物、事件为咏吟对象，对司马迁人品、思想、作品主题等等也都有接受，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咏史诗创作者。如“初唐四杰”、宋之问、陈子昂、李白、杜甫、刘禹锡、刘长卿、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等等。中晚唐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较为特殊的创作群体，即是被称为“专职咏史诗人”的胡曾、周昙、汪遵等，他们创作咏史组诗、咏史诗集，其中大部分诗歌都取材《史记》足见其受《史记》影响之大，应看作是接受《史记》的特殊成果。如表下：<sup>②</sup>

①《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第1655页

②因受《史记》影响而作的咏史诗，除吟咏《史记》中单个或两个人物、事件之外专咏合咏之外，还存在大量泛咏之作，这些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咏多人或者是整体性吟咏，在此分类统计中，颇难断其归属，因此，这里只取专咏和合咏之作，泛咏之作除去泛咏一篇者均另论之。



| 相对应的<br>《史记》篇目 | 唐诗吟咏之人、事、物   | 数量        | 小计 |
|----------------|--------------|-----------|----|
| 五帝本纪           | 黄帝、尧、舜、其它    | 8、3、10、1  | 22 |
| 夏本纪            | 禹、太康         | 14、1      | 15 |
| 殷本纪            | 商汤、比干、傅说     | 1、5、1     | 7  |
| 周本纪            | 周文王、武王、幽王、其它 | 2、3、2、4   | 11 |
| 秦本纪            | 秦穆公、其它       | 2、1       | 3  |
| 秦始皇本纪          | 秦始皇、长城、胡亥、其它 | 21、10、4、2 | 37 |
| 项羽本纪           | 项羽、鸿门宴、范增、其它 | 21、3、4、2  | 30 |
| 高祖本纪           | 高祖、四皓、纪信、其它  | 25、30、4、2 | 61 |
| 孝景本纪           | 汉景帝          | 1         | 1  |
| 孝武本纪           | 汉武帝          | 12        | 12 |
| 吴太伯世家          | 泰伯、季札、阖闾、夫差  | 4、6、5、32  | 47 |
| 齐太公世家          | 姜太公、齐桓公      | 11、2      | 13 |
| 鲁周公世家          | 周公、其它        | 4、1       | 5  |
| 燕召公世家          | 燕昭王、郭隗       | 8、2       | 10 |
| 卫康叔世家          | 卫灵公          | 1         | 1  |
| 晋世家            | 晋文公、介子推、其它   | 2、4、4     | 10 |
| 楚世家            | 楚灵王、息夫人、其它   | 5、5、3     | 13 |
| 越王勾践世家         | 勾践、范蠡        | 5、9       | 14 |
| 郑世家            | 子产           | 1         | 1  |
| 赵世家            | 赵简子          | 2         | 2  |
| 魏世家            | 田子方          | 1         | 1  |
| 孔子世家           | 孔子           | 15        | 15 |
| 陈涉世家           | 陈涉           | 1         | 1  |
| 外戚世家           | 陈皇后、卫夫子      | 1、1       | 2  |
| 萧相国世家          | 萧何           | 4         | 4  |